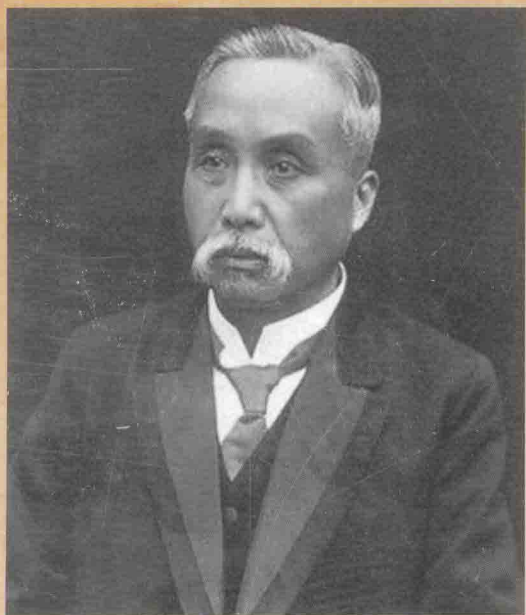




徐世昌与轺养日记

戊戌年

徐世昌



北京出版社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徐文与杨善喜日记



戊戌篇

北京出版社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 戊戌篇 / 北京出版社编.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200 - 10642 - 8

I. ①徐… II. ①北… III. ①徐世昌(1855 ~ 1939)
—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0860 号

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 戊戌篇

XU SHICHANG YU TAOYANG ZHAI RIJI WUXU PIAN

北京出版社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7.5 印张 198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0642 - 8

定价: 4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点评历史人物，总因无固定之义例可循，故其创制之径路逐宽。我的同事徐定茂先生，徐世昌老先生之后。博文广识，文笔畅达。曾见其于《北京文史资料》载文数篇，计有“戊戌年间的徐世昌”“小站练兵时的徐世昌”等，参错纂述，为人称道。文均结合其祖《韬养斋日记》，虽不以专项研究命名，而却另具独特风格与趣味。现今其所编《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 戊戌篇》等将付印行。征序于予，辞不获命。自言此书结撰，仍以日记为主，是以配合北京出版集团刊印《徐世昌日记（韬养斋日记）》影印本及点校本……予读后思，徐世昌老先生一生经历，或位尊而无权，或事丛而任短。故在位期间之政治建树远不及其在野学术贡献之较有可述。然民初北京政府时期，先后就任总统者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曹之后，继而起为段祺瑞临时政府、为张作霖海陆军大元帅。所最需注意的是，像袁、黎、冯、曹、段、张，是为武夫，唯徐

世昌以逊清翰林起家，外任疆圻，内管枢府。更以曾佐小站练兵之故，与北洋军系宿有渊源。故民国后，遂能以手无一兵一卒之一文人，终掌北京政府最高权力。论其生平，于清末民初政治上的消长得失关系甚为巨大，实属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徐世昌老先生，进士出身。以朝考一等授翰林院庶吉士。当甲午中日战败后，袁世凯由朝鲜回京。袁、徐两人当时均不甚得志，但私交素笃，乃一同参加康有为、梁启超所创之强学会。后袁世凯奉旨督练新建陆军，是于天津小站，即以徐以参谋营务处。徐虽居袁幕，分属客卿，且交谊非同泛泛。各项资料均述：袁、徐彼此，一刚一柔，相济相扶。其时正值戊戌变法，而世常论，戊戌之败，败于袁世凯之告密。但在徐世昌老生日记记述下袁当时的出没去留，皆必有其起伏之迹象。如“戊戌七月廿六日晨起，写信，办公。会客。到冯华甫（冯国璋）处。午后校书。办公、会客。晚慰廷（袁世凯）自津来德律风，约明日赴津”“七月廿七日慰廷约赴津。黎明冒雨行，道路泥泞。乘车三十余里，骑马三十余里，日西到。与慰廷谈。夜归，又与慰廷谈。嘱明日赴京”等，均利于研究袁的权衡利益得失、决疑定策舍取选择的过程，读者亦可由此抉当事者功过之辨。

徐世昌老先生病歿于民国二十八年，也就是1939年6月6日，得年八十五岁。时适“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平津已沦陷于日寇。老先生未逝前，日方曾遣数人游说其门，威逼利诱，拥戴出山，组建伪政以分割中国。老先生

终不为所动，凛然严拒，卒全晚节。逝世次日，香港《大公报》社论云：“盖棺定论，徐世昌终不失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也”。

见现有关政治人物评述，多是出于作者好恶，文字评判，常以掩饰真情。恩怨功过，难得齐平。但问世间，怎有“完人”？对近代史研究，切勿偏于政治立场，视敌对者一无是处。现随之日记刊行以及由此而出的《徐世昌与韬养斋日记 戊戌篇》等，论者褒贬可鉴日记之原始资料，努力求其接近可信之程度，是为终。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潘利群' (Pan Lixu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潘利群：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市第十三、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目录

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徐世昌

——读《徐世昌日记》 吴世民 / 1

戊戌年间的徐世昌 徐定茂 / 11

小站练兵时的徐世昌 徐定茂 / 26

从《韬养斋日记》看戊戌前后的徐世昌 张海荣 / 43

戊戌风云中的徐世昌 解玺璋 / 87

对徐世昌家族的考察 贾熟村 / 102

历史的正能量 张敬东 / 113

戊戌年八月的法华寺 杨庆徽 / 117

管窥《韬养斋日记》 李慧娟 / 123

日记中的菠萝蜜、荤白菜及德律风 徐 骊 / 132

编后记 / 137

附一：徐世昌后代情况表

附二：《韬养斋日记·戊戌》（手稿）

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徐世昌

——读《徐世昌日记》

吴世民

民国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短（在中国内地为1912年—1949年，仅37年），却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颇具争议的人物。这段历史既传承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又对后来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这段历史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存在很多疑点以及不为人知的地方。

作为民国初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北洋政府的一位总统，徐世昌这一历史人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文人出身的徐世昌能够登上总统宝座殊为不易。说徐世昌是文人一点也不为过，他自幼熟读经史，且能吟诗作画，其价值观取向与人生旨趣，在童年时就已经奠定了基础。徐世昌出生在河南的汲县（今卫辉市），经历堪称坎坷，1861年，其父徐嘉贤就已去世，年仅25岁。当时只有6岁的徐世昌尚在私塾读书。有材料介绍说，他的父亲是员猛将，17岁时就在战场上搏杀，勇往直前，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英年早逝。

1879年3月，24岁的徐世昌受邀为淮宁县知事整理文案，结识了在陈州寓居的袁世凯。初次相见，两人即纵谈“当世之务”，深得袁世凯赏识。当时徐世昌家世贫寒，甚至凑不齐外出赶考的盘缠，袁即慷慨解囊，赠其纹银200两。徐氏兄弟两人方得以成行，并同时中举。四年之后，徐世昌又高中进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张之洞和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均是徐世昌的师长。

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徐世昌供职翰林院十几年，度过了人生的不惑之年，在此期间的徐世昌算得上地地道道的文人。

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奉清廷之命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苦于手下无得力的可用之才，1897年，他邀徐世昌前去帮忙。在别人想都不敢想的跨界之举，四十多岁的徐世昌却没有太多的犹豫，他毅然离开翰林院来到天津，担任起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徐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时他还能代理其职，很快成为袁的得力干将。

小站练兵的这段历史，有人说，那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果如此，袁、徐皆功不可没。徐世昌虽是文人，又是初入行伍，但他出身翰林，知识广博，态度勤勉，很快赢得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姜桂题、张勋、曹锟等新军将领的尊敬，大家称其为老师。徐世昌为袁世凯大胆地开拓改革军事出谋划策，提出并实践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近代军事理论，制定了中国近代一系列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和战略战术原则。小站练兵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都是从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却成为他日后在政坛发展的起点，也成为他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此后他累获擢升。1905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

徐世昌崛起于小站练兵，故后人多将袁世凯视作徐官运亨通的有力奥援。不过，徐世昌虽然得益于袁世凯之提携，却并不依附于袁世凯，这也是他日后在袁世凯倒台之后仍然能够青云直上的重要原因。

1912年3月，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徐并未随之喜形于色，而是力辞要职，隐居青岛观望时局变化。直到1914年5月，袁世凯依据新的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徐世昌才出任国务卿。第二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世昌力谏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哪里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徐世昌深知局势难卜，再一次力辞而去，退居河南辉县水竹邨。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徐遂再次出任国务卿。上任伊始，他即要求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在被拒绝之后，为了避嫌，任职仅一月的徐世昌再次去职，临行前他力荐段祺瑞继任。综观这些史实可以看出，徐在为袁尽力的同时，又不忘坚守原则和保全自身，堪称是有大智慧之人。

徐世昌日记以“韬养斋”命名，这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他的性格韬略。“韬养”即“韬光养晦”之意，比喻隐藏才能，不使外露，进退有度，伺机待发。《韬养斋日记》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看似流水账式的日常记录中，隐藏着徐精心营造的为人处事之道，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八字秘诀：圆通、沉稳、柔韧、机警。

徐世昌为人处事小心谨慎，不以党派示人，不骄矜，不傲慢，不躁动，时机不成熟不盲目行动；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也不疏远旧派权要。他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把官场上的“中庸之道”拿捏得恰到好处，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会做官的人，赢得“水晶狐狸”的称号。

在他就任总统之前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这位前清的翰林借助和袁世凯“结拜兄弟”的特殊关系以及不同于其他北洋要员的儒者风度，一直以中间人的身份调解着各个派系的斗争，并借此保持着平稳上升的政治态势，在晚清的内阁和民国政府里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徐以北洋元老身份应邀抵京调解。5月，黎、段之间的矛盾达到白热化，黎元洪撤了段祺瑞的总理之职，邀请徐世昌继任；段祺瑞则在天津另立政府，请徐世昌担当大元帅。徐世昌皆不为所动，一一加以推谢。6月，张勋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企图进军北京复辟帝制。在这紧要关头，徐世昌力劝张勋，但张不听，入京后悍然发动复辟，欲任命徐世昌为伪弼德院院长，徐世昌照例托故不就。

在一来二去的调和之中，迎来了国会的总统选举，面对闹得不可开交的段祺瑞和冯国璋，以不争为争的徐世昌的威望逐步上升，反而成了中华民国第二届总统的“最佳人选”，冯和段都不得不退到幕后。

1918年9月1日，总统权位大战的序幕拉开，徐世昌宅居北京东四五条胡同，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和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特往徐宅探视，敦劝徐出任大总统。六十多岁的徐世昌言道：“诸君何苦推我衰朽之人登台？”

梁士诒说：“除你之外，无人能解决时局。”

徐答道：“诸君以国家为前提，责我以大义，我亦无法。但是诸君举我，是希望我将一切事件办好，究竟我出山之后办得好不好，我亦无把握。”

为了试探自己到底有多少胜算，9月3日，徐世昌策划了一个“安福俱乐部总统预选会”，到会者384人，徐得了383票，其中一人弃权，大家一致举徐为总统。

徐世昌给自己留足了后路，心中又有了底数，才肯在众人拥戴下出山。9月4日，总统选举在位于北京宣武虎坊桥的众议院正式举行。出席选举的议员436名，其中参议员131名，众议员305名，徐世昌获得了425票。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当即宣布徐世昌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通电随即发给各省督军：

“本日选举，天气晴和，人心静穆，议场秩序雍容，投票整肃，

外人参观者，同声赞美，且谓既无武力作用，又无金钱关系，在历史上殊不多见。”

徐世昌的执政理念可以概括为“偃武修文”四个字，这在他的就职誓词中烙有鲜明的印记。所谓“偃武”，就是下令对南方停战，结束南北武力对抗；所谓“修文”，就是重用文臣，排斥武人。

当时国内最大的问题是南北分裂，徐世昌名为中华民国总统，但北京的北洋政府和广州的军政府事实上处于敌对状态。国人厌倦武人专政、南北纷争的现状，对“文治”及和平充满憧憬，全国上下弥漫着一派祈求和平的浓厚氛围。陈独秀就曾对徐世昌的“文治主义”寄予厚望，他说：“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是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南北和平动议，法、意等国相继表示支持。

但武夫时代的文治梦想何其难也！徐世昌的执政之路步履维艰。徐世昌上任后，主动下令对南方停战，努力调和南方和北方之间的矛盾，筹划“南北议和”会议。虽经多方努力，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不仅南北议和停滞不前，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还进一步激化，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更使徐世昌遇到了空前的执政危机。

五四运动爆发之时，身为大总统的徐世昌，没有任何准备，面对突发的学生运动，其矛盾的心理和态度导致他对学生的态度随着事态的变化而变化。在运动之初，他力图保持和学生之间的谅解态度，5月7日下令释放了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全部学生。随着五四运动从北京波及全国，由学界推至各界，徐世昌一度采取强硬措施：明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演说、散发传单；加强舆论控制，实行新闻检查。在巴黎和会签字与否的问题上，他也改变了原本犹豫不决的态度，于5月23日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即使不能保留山东条款，也要全约签字。次日，政府把主张签字的通告致电各省，名为征求意见，实为争取支持。

6月3日、4日两日，北京学界继续上街演讲。军警根据徐世昌的禁令，逮捕了近千名学生，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还在北大外面搭起帐篷，包围了北大。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将事件压制下去，反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声援活动。从上海开始，除了学生罢课外，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把五四运动推向最高潮。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徐世昌再次改变策略。为了平息众怒，他主动向国会参、众两院提出辞呈。在辞职咨文中，他就对德和约与南北和会进行了评判和辩护。

关于对德和约，他说：

“原拟全约签字，惟提出关于胶澳各条声明保留，此项原属不得已之办法。但体察现情，保留一层，已难办到。……内审国情，外观大势。惟有重视英、美、法各国之意见，毅然全约签字，以维持我国国际之地位。……惟是国内舆论，坚拒签字，如出一辙……欲以民意为从违，而孰等利害，又不忍坐视国步之颠蹶。此对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也。”

关于上海的南北和会，他讲：

“乃沪议中辍，群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决之方；在中央欲进和平，而终乏积极进行之效。……此就对内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也。”

这份辞职咨文，按今天的话说是讲客观原因多，说主观原因少，但徐世昌的这种姿态还是为各方所接受。参、众两院议长李盛铎、王揖唐亲自登门退还徐大总统的辞职咨文，并联名通电：

“查现行约法，行政之组织，系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当由盛铎、揖唐即日躬资缴还，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

徐世昌的辞职引起全国各界的震动。当是时，各地要求徐世昌留任的呼声成为主流，徐的政敌，在运动发生之初对徐世昌大为不满的段祺瑞，也亲至徐宅挽留。

6月28日，徐世昌亲自接见群众代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即电告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不予签字。至此，五四运动争取拒签的目的在表面上已经达到了，徐世昌也得以继续留任总统。

徐世昌虽然化解了一时之危，但终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实的矛盾，这也是他日后下台的隐患之所在。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知识界的态度还算比较温和。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地展开，也有赖于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徐世昌名为总统，但夹在直、皖两派中间，并无多大实权。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俱在。在外，倭寇虎视眈眈；在内，军阀割据。即便如此，在他执政的这段时间，中国的民族工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社会思想也是中国历史上较为解放的时期之一，报纸杂志言论相对自由，共产主义思潮得以兴起。五四运动没有遭到残酷镇压，也似乎应部分归功于他“偃武修文”的政策主张。

综观徐世昌一生，在原则是非问题上，他基本上能够保持清醒，特别是晚年不为日本人所惑、拒绝日本人的劝诱，不供伪职的情操和气节，很值得人们称赞。

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6月，徐世昌被吴佩孚、曹錕“逼宫”下野，结束了他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生涯，也结束了他从政40余年的风雨历程。徐世昌退隐天津17年，自书“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之斋”匾额，立志不过问政治，不参与党争，过起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为了在华物色代理人，派人造访徐世昌，力劝徐出山为日本人做事，声称南京政府是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并引诱徐说，如果此时他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徐世昌识破日本人的阴谋，断然拒绝。

为了拖徐世昌下水，日本侵略者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38年初，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分别约请徐世昌见面，但徐世昌托病不出。无奈之中，日本人又派徐世昌的学生前往游说，甚至抬出末代皇帝溥仪来压迫徐世昌就范，都被徐世昌严词拒绝。

晚年的徐世昌患病，经诊察是膀胱癌。北京有关方面邀请徐世昌进京治病，本来他的病情可以通过治疗得到缓解，但徐世昌担心自己离开天津后会被日本人胁迫，权衡再三，选择了放弃治疗。1939年，85岁的徐世昌在天津病逝，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褒扬：

“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觊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

无论得意于官场还是失意于山野，徐世昌都对诗画情有独钟。他出身翰林，博学多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传统文化造诣很深。

论诗文，徐世昌有“总统诗人”之美称。1918年辑印《水竹邨人诗集》12卷，1924年刊行《归云楼题画诗》6卷，至1933年刊行《拣珠录》，共刊行8集76卷，可谓洋洋大观。后人评价徐诗“优浙而闲适，简洁而清远，抒写性情，旷然无身世之累”。他在给严范孙的一首诗中写道：“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创徒。”此诗恰切地表现了士者飘然山林，宦途如梦的退耕复杂心态，磊落高华，舒卷自如，颇有“超凡入圣”的浪漫，同行评价为“吟咏之功，度越前人”。归隐之后，他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创设“晚清簪诗社”，并遴选清诗，在1929年由其退耕堂刻印成书。该集原名《清诗汇》，后来考虑到作者多为民国之人，因此更名为《晚晴簪诗汇》。全书凡二百卷，入选作家多达6168人，是目前单种规模最大的一部清诗总集。

论绘画，他善山水和松竹，喜欢绘制扇面，造诣甚高，其代表作有《晴风露月四竹图》等，后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他的画

作“平淡天真，意趣高古；笔锋凌厉，状如削玉；诗画相映，书画同体；神韵相连，清爽不凡”。

论书法，他师承颜苏，博采众长，有《水竹邨人临帖》《石门山临图帖》等问世。他还酷爱古砚、古墨，收藏端砚颇多，并将所藏之砚的花纹、题识，一一墨拓而成《百砚谱》一册，成为中国近代唯一一部评砚专著。

徐世昌日记共100册（存99册），约200万字，起自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2月15日他中进士之前，终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5月19日他临终前半个月，共计54年。这54年浓缩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他对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新文化运动、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中国近代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耳闻目睹，他的日记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和折射。

近代史上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徐世昌有时是直接参与者、有时是推动者或阻拦者。徐世昌始终对亲历耳闻的诸多事件均详加记录，内容涉及所历要事、政情内幕、人事更迭、日常交游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内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对今天的文史工作和首都文史的研究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时间上看，徐世昌的《韬养斋日记》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从内容上讲，覆盖了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更为难得的是，近代名人日记虽然并不鲜见，但多出自学者之手，像徐世昌这样的政界高层亲笔日记非常罕见，《徐世昌日记（韬养斋日记）》的出版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乃至学术史的研究，都具有无法比拟的重要价值，甚而可能填补某些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

《徐世昌日记（韬养斋日记）》具有珍存史料和传播历史文献的双重功用，它的出版对于史学界、文献学界、文学研究界和书法界都是一个福音，对于促进文化繁荣也必将产生重要影响。《韬养斋日

记》连贯记录了每日要闻，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也为研究徐世昌的政治观点和学术主张提供了系统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韬养斋日记》是徐世昌亲笔所写的私人日记，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很符合政协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特色。另外，徐世昌作为北方政界要人，亲历了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虽然他并非始终代表进步力量，但正是因为这一层关系，从政协文史资料的角度看，《韬养斋日记》更具有允许“多说并存”的统战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将徐世昌日记保存完整的徐世昌后人徐定茂先生与首都文史有很深的渊源，他是北京市政协第九、第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第十二届特邀委员。他不仅精心珍藏和保护徐世昌日记，还潜心研究，曾应北京市政协文史学习委的邀请和建议，先后在北京市政协文史学习委主办的《北京文史资料》上发表了《徐世昌笔下的五大臣被炸事》《徐世昌与“水竹邨人”》等多篇文章，2011年在举国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之际，他又与北京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合力推出了《读辛亥前后的徐世昌日记》，对于保存历史记忆，还原历史真相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此真诚地希望各界有识之士，都能如徐定茂先生一样，把有价值的史料存下来、写出来、传出去，共同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吴世民：北京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